

#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 从封闭到开放<sup>\*</sup>

王晓林 臧秀玲

[ 内容提要 ]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在自民党内部竞争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自民党总裁选举经历了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从“寡头竞争”到“民主选举”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恶性竞争”到“良性竞争”的过程。随着自民党总裁选举开放性的发展,自民党党员和党友逐渐摆脱了派阀的控制,能够独立投票,提高了对总裁选举结果的影响力。总裁选举的开放性使自民党回归政党本位的组织形态,向中央集权型组织政党转型,加强了党员和党友的党内政治监督权利,对日本政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 关键词 ] 日本自民党 总裁选举 日本政党政治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19.04.017

根据日本自民党总裁公选章程,自民党总裁由党所属的国会议员、党员、自由国民会议会员及国民政治协会会员(自由国民会议会员及国民政治协会会员,以下简称“党友”)公选产生。<sup>①</sup>但是长期以来,自民党总裁选举其实是在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党员和党友的参与度比较低,其话语权被国会议员所掌握,而国会议员又被各派阀领袖所掌控,因此,自民党总裁选举不过是不同派阀领袖之间“寡头竞争”的结果,这引起了自民党的党员、党友以及党内部分高层开明人士的不满,他们不断要求改变这一状况,以获取更多的支持力量,稳固自民党的根基。在总裁选举发展进程中,自民党逐渐开始进行党内改革,扩大党员和党友的参与度,不断提高党员和党友地方选票的比重,力求打破总裁选举的封闭性,扩大开放性。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使自民党总裁选举实现了从“寡头竞

争”到“民主选举”、从“恶性竞争”到“良性竞争”的改变。

## 一、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发展阶段

日本自民党自成立以来进行了一系列总裁选举方式的变革,主要是从封闭迈向开放。从总体上看,自民党总裁选举从封闭向开放的发展进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 (一) 封闭性总裁选举阶段(1955—1976 年)

自民党在 1955 年成立之初既包容了右翼民

<sup>\*</sup> 本文系 2018 年度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冷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适应性变革研究——基于日本共产党和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SDZG2018020103)的成果。

<sup>①</sup> 「総裁公選規程」第一条, <https://www.jimin.jp/aboutus/pdf/organization.pdf> を参照。

族主义思想,又继承了中道思想以及自由民主思想,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上具有包容性和多样性。作为不同利益、不同政策、不同人际关系的结合体,自民党呈现出派阀林立的格局。在成立之初,自民党党内共有11个派阀,经过分化组合,形成了自民党的“八大师团”,即池田勇人派、佐藤荣作派、石井光次郎派、大野伴睦派、河野一郎派、石桥湛山派、岸信介派以及三木武夫派。在佐藤内阁时期,随着池田派、河野派、大野派等领袖的相继过世,自民党内部又进行了新一轮的分化组合,重新形成了十余个派阀。随后经过十多年的派阀之争,自民党内部最终形成了三木武夫、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五大派阀角逐的格局,这一时期被称为“三角大福中”时代。<sup>①</sup>派阀在不断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失去了拥护总裁领导的初衷,变成了以金钱和地位为目的而团结起来的小利益集团。

自民党为了消除各派阀在总裁人事问题上的对立,实现“保守合同”,创立了总裁选举制度。根据成立之初的自民党总裁公选章程,自民党总裁由党大会投票选举产生,国会议员和都道府县支部联合会各两名代表具有投票权。<sup>②</sup>可见,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结果受到国会议员选票和都道府县支部联合会代表选票的影响,但是实质上国会议员选票和都道府县支部联合会代表选票又都受到自民党内部不同派阀领袖的制约。一方面,派阀领袖可以推选国会议员候选人,分配政治资金,决定党内职务,在党内政治中起到主导性的作用。在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国会议员投票上,国会议员一般都遵从所属派阀领袖的意志进行投票。另一方面,都道府县支部联合会决策受到派阀下属的国会议员个人后援会的影响。对自民党总裁选举的都道府县支部联合会代表来说,他们同样遵从国会议员所属派阀领袖的意志进行投票。在这一较为封闭的总裁选举阶段,各派阀为了总裁职位进行了激烈而残酷的竞争,为了赢得总裁选举不惜以分裂自民党为要挟。

## (二) 开放性总裁选举的初步探索阶段 (1977—1993年)

起山一郎、岸信介和田中角荣为了消除派阀政治,试图从变革选举制度出发,废除中选区制,实行小选区制。由于受到党内派阀的强烈反对,

结果均以失败告终。在此教训下,三木武夫和福田赳夫决定采取相对温和的方式探索相对开放性的总裁选举模式,在不改革选举制度的基础上,推行总裁预备选举制度,让党员和党友参与总裁选举。三木将总裁选举的投票权扩大到全体党员和党友,将自民党由以派阀和国会议员个人后援会为中心的议员政党向以党员为中心的组织政党转化,进行党内民主化建设。但是,总裁预备选举制度方案同样因其他派阀的批判与抵制而最终被搁置。福田吸取了三木的教训,成立了党改革实施总部,在党改革实施总部下又设立五个委员会,负责讨论由党员和党友参与的总裁预备选举制度的诸多问题,以消除党内派阀政治、将自民党建设成为开放性的国民政党。<sup>③</sup>福田最终在1977年4月的自民党临时大会上通过了党员和党友参与的总裁预备选举制度。随着总裁预备选举制度的确立,福田开始进行解散派阀的运动。总裁预备选举制度在原则上有利于消除派阀的政治影响力,提高党员和党友对党内事务的参与热情,促进自民党向开放性政党发展。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派阀迅速“死灰复燃”,通过金钱贿赂等手段,动员支持本派阀的国会议员个人后援会的成员、相关人士及普通社会民众加入自民党,进而干预总裁选举。

实际上,总裁预备选举制度具有三个预期目标:一是让自民党全体党员和党友参与总裁选举,切实反映全体党员和党友的意志,维护全体党员和党友的权利;二是进行党内改革,消除派阀对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影响,消除自民党内部的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三是吸纳更多的党员,壮大自民党的组织势力,营造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党内政治环境。<sup>④</sup>但是,在1977—1993年间,自民党共进行了13次总裁选举,其中有党员和党友参与的总裁选举仅有三次。<sup>⑤</sup>同时,党员

① 栾欣超、谭君久《日本自民党派阀政治探析》,载于《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② 中北浩爾『自民党政治の变容』NHK出版2014年第21—22頁。

③ 『党のあゆみ 第八代福田赳夫』,http://www.jimin.jp/aboutus/history/prime\_minister/100342.htmlを参照。

④ 中北浩爾『自民党政治の变容』NHK出版2014年第74頁。

⑤ 上神貴佳「選挙制度改革と自民党総裁選出過程の变容—リーダーシップを生み出す構造と個性の相克—」,『選挙研究』2010年26巻1号。

和党友的投票意志同样受到派阀领袖的制约。这表明开放性总裁选举的初步探索遭遇失败,并没有达到福田的预期目标。随着时间的发展,派阀日益限制了自民党党组织的灵活性,最终导致自民党在1993年沦为在野党。

(三) 开放性总裁选举实质发展阶段(1994年至今)

沦为在野党的自民党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激发政党组织的活力、重回执政地位,从1994年开始持续探索消除派阀对总裁选举的干预,进行实质上的开放性总裁选举。1995年,自民党举行沦为在野党后的首次总裁选举,为了吸纳更多的党员加入,自民党采取了党员一万张选票等同于国会议员一张选票的投票方式,桥本龙太郎和小泉纯一郎被提名为总裁候选人。由于桥本得到当时最大的派阀小渊惠三派的支持,而小泉当时在党内知名度不高,桥本成功当选自民党总裁。在1998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小泉仍然没有竞争过当时最大派阀的领袖小渊惠三,小渊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在1995年和1998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小泉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他的党内知名度获得了提高,为其要求增加党员和党友地方选票以挑战党内主流派阀支持的总裁候选人奠定了基础。2000年4月,小渊由于身体原因突然辞去总裁职务,森喜朗在众参两院议员总会的决议下当选为自民党总裁。但森当选自民党总裁过程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遭到日本媒体的普遍批判与质疑,森内阁支持率不断下降。<sup>①</sup>

在此契机下,小泉表明了要革除自民党腐朽体制的决心,提倡没有禁区的结构性改革,党内人气急剧上升。拥护小泉的国会议员和地方组织要求党的中央执行部增加总裁选举中党员和党友的地方选票,寻求更加开放的总裁选举。在这一政治压力下,自民党中央执行部决定赋予国会议员和都道府县支部联合会各三名代表在总裁选举中的投票权,并规定大多数都道府县支部联合会代表的投票意向由各都道府县的党员和党友参与的预备选举决定。<sup>②</sup>2001年3月,森辞去总裁职务。在同年4月的总裁选举中,桥本和小泉再次交锋。桥本受到当时最大派阀桥本派的支持,代表国会的主流势力,而小泉得到党内非主流派山崎拓和加藤统一的支持。由于自民党发展停滞,为了使

自民党重新焕发活力,自民党部分国会议员开始将希望寄托于“政治怪人”小泉。<sup>③</sup>小泉的改革政策深得党员和党友的支持,在地方上拥有很高的人气。最终,在国会议员选票上,小泉获得175票,桥本获得140票;在党员和党友地方选票上,小泉获得123票,桥本获得15票。由于在党员和党友地方选票上出现“小泉一边倒”的局面,小泉成功赢得2001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当选党总裁后,小泉进一步增加了党员和党友的地方选票,决定将地方选票从都道府县支部联合会各三张改变为总共300张。在此后的2003年、2006年、2009年和2012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都采用国会议员选票和地方300张选票的选举方式。值得说明的是,自民党在2009年众议院选举中出现失利,国会议员减少到199人,党员和党友地方的300张选票因而成为左右总裁选举结果的关键性因素。<sup>④</sup>在小泉的推动下,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开放性得到实质性发展。

2012年安倍晋三内阁成立,经过六年的政权经营,形成了“安倍一强”的党内格局。安倍在加强党内集权的同时,不断扩大党员和党友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的参与度,试图削弱对其“一强”地位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质疑。2018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进一步扩大了党员和党友地方选票比重,使地方选票的数量增加到与国会议员选票数量一致,各有405张,进一步增加了党员和党友地方选票的比重。<sup>⑤</sup>在安倍和石破茂作为候选人的2018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安倍不出意外地获得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而在党员和党友的地方投票中,由于安倍推行的“安倍经济学”没能让地方中小企业受益,党员和党友对他产生了较大质疑。此外,安倍的“森友学院丑闻”和“加计学院丑闻”

① 濱本真輔『現代日本の政党政治—選挙制度改革は何をもたらしたのか』有斐閣2018年第179頁。

② 井芹浩文「自由民主党(自民党)総裁公選規程」,https://imidas.jp/genre/detail/C-103-0026.htmlを参照。

③ 山崎拓「山崎拓がいま明かす、『小泉純一郎総理誕生秘録』」https://gendai.ismedia.jp/articles/-/49298を参照。

④ 井芹浩文「自由民主党(自民党)総裁公選規程」,https://imidas.jp/genre/detail/C-103-0026.htmlを参照。

⑤ 「総裁選挙の仕組み(概要2018年版)」,https://jimin.jp-east-2.os.cloud.nifty.com/pdf/aboutus/organization02.pdfを参照。

问题也被党员和党友所批判。相比安倍,石破担任过地方振兴大臣,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振兴地方经济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党员和党友的支持。最终,在国会议员选票上,安倍获得329票,石破获得73票,出现了“安倍一边倒”的局面;而在党员和党友地方选票上,安倍获得224票,石破获得181票,安倍并没有取得很大的优势。开放性总裁选举的实质性发展为总裁选举增加了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也给总裁候选人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从1994年至今,自民党共进行了15次总裁选举,其中有党员和党友参与投票的总裁选举高达十次。党员和党友地方投票权的扩大使开放性总裁选举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尤其在2001年和2018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 二、自民党总裁选举开放性发展的原因

作为保守主义政党,自民党在总裁选举和政党转型的探索中保持了自身特色。自民党推进总裁选举开放性发展、重视党员和党友地方选票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确立导致派阀政治影响力的降低

派阀的存在背离了自民党总裁选举为了强化党中央执行部权威和确保地方组织参与的初衷,阻碍了总裁选举的开放性发展。在总裁选举的前两个阶段,日本众议院选举采取中选区制的选举制度。在中选区制下,派阀领袖在选举、资金和人事上发挥重要的政治影响力,主导党内政治事务,导致了党内的金钱政治,使自民党面临严重的执政危机,因而必须进行党内改革。在开放性总裁选举初步探索阶段,即使福田赳夫确立了总裁预备选举制度,但只要中选区制继续存在,派阀领袖就能够继续干涉总裁选举的结果。

1994年,由非自民党的八大党派联合执政的细川护熙内阁将中选区制改革为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同时还通过了《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和《政党助成法》等一系列政治改革法案。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规定,众议院议席定数为500个,其中小选区议席300个,比例代表选区议席200个。此后,众议院议席定数得到两次调整,现为465个,其中小选区议席289个,比例代表选区

议席176个。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选举制度以小选区制为中心。<sup>①</sup>在小选区下,同一选区只有一名自民党候选人,且候选人必须得到党中央执行部的正式认可。在比例代表选区下,候选人名单排序也要由党中央执行部决定。因此,派阀失去了推选候选人的政治能力,派阀的影响力不断衰退。同时,《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要求国会议员政治资金透明化,禁止国会议员接收企业和团体的政治献金,这严重削弱了派阀筹集政治资金的能力,使派阀势力受到进一步削弱,派阀领袖在总裁选举中的主导性地位受到削弱,对党员和党友地方选票的控制力下降,使党员和党友能够独立自主地将选票投给所支持的总裁候选人。

(二)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反映更多党员和党友的需要

在封闭性总裁选举阶段,日本选民结构单一,自民党主要通过国会议员个人后援会联络选民以争取得到选民的支持。在国政选举和地方选举中,国会议员个人后援会的成员不仅投票率高,而且会积极动员周围社会民众进行投票,对自民党赢得选举起到了重要作用。在1958年众议院选举之后,国会议员个人后援会非常普及,每位国会议员个人后援会的成员平均有两万至三万人,若包含未加入个人后援会但与个人后援会有关系的人员,国会议员个人后援会的成员及相关人士甚至可高达五万人。<sup>②</sup>而国会议员个人后援会的成员及相关人士一般不是党员,这就为自民党的稳定性发展埋下了隐患。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社会结构发生着显著变化,自民党也面临着政党转型。在开放性总裁选举初步探索阶段,为了吸引社会民众加入自民党以壮大政党力量和维持执政地位,福田赳夫建立了总裁预备选举制度,并在国民政治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自由国民会议的党友组织,企图淡化政党色彩,着重发展社会友好力量,谋求进一步扩大自民党的支持基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社会结构

<sup>①</sup> 张伯玉《论日本自民党的中央集权化》,载于《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

<sup>②</sup> 佐藤慎吾「後援会の空間組織と選挙戦略—衆議院富山県第三区を事例として—」,『季刊地理学』2008年60卷1号。

的日益复杂化和国会议员个人后援会势力的削弱,日本传统的选民结构也发生着深刻变化。1993 年下台后,自民党党员数量急剧下降。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市民社会,以及另一大保守政党民主党的崛起,通过扩大党员党内政治权利以吸纳社会各阶层成员入党成为自民党不得不面对的政治课题。在 2009—2012 年民主党执政期间,自民党的党员数量进一步减少,2013 年末,自民党党员数量降到史上最低的 78 万人。由于党员数量的减少,自民党的政治影响力也呈现出下降趋势。<sup>①</sup> 为了挽回颓势,自民党不断增加党员在总裁选举中的投票比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社会民众,使处于低谷的自民党不至于解体。随着党员权利的扩大,自民党的党员数量从 2014 年开始连续五年实现增长,到 2017 年增至 106 万人。

### (三) 出于巩固党的地方组织的考虑

自民党地方组织具有自治性和多样性,能够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进行灵活管理。由于这种自治性,自民党在 1974 年参议院选举中遭遇失败,但在都道府县议会中仍然保持优势地位。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自民党沦为在野党之前,自民党在都道府县议会中的议席率约为 55%;1993 年沦为在野党后,很多国会议员退出自民党,但是国会议员下属的大部分地方议员仍然支持自民党,它在都道府县议会中的议席率仅仅下降约 5%,在大多数都道府县议会中仍然占据多数议席。<sup>②</sup> 随着都道府县议会中政党数量的不断增长,自民党的地方议员也未出现分裂或大面积退党的现象,表现出强大的统一性。<sup>③</sup>

进入 21 世纪,自民党越来越表现出卡特化特征,不再注重地方组织在国政选举中的基础性作用,而导致 2009 年众议院选举的失利。但是自民党在都道府县议会中的议席数没有受到此次下台的影响,这使自民党中央执行部再次认识到地方组织的重要性。2012 年自民党再次执政后,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石破茂表示,在野的自民党在没有权力、资金和职位的状态下之所以没有支离破碎,就是因为有地方组织的支撑。继任干事长谷垣禎一也表示,自民党最大的优势是拥有强大的地方组织。<sup>④</sup> 为了回馈地方组织,自民党中央执行部通过开放性总裁选举的方式扩大党内权

利,使地方议员不断向自民党靠拢,以确保自民党的长期稳定性发展。

## 三、自民党总裁选举开放性发展的影响

自民党总裁选举开放性发展在影响党内政治的同时,也对日本政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 (一) 对自民党党内政治的影响

自民党总裁选举开放性发展对自民党的政党模式和监督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促进自民党由议员政党向组织政党转型,成为中央集权型政党。随着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开放性发展,派阀势力日益被瓦解,国会议员凝聚力下降,而以总裁为中心的党中央执行部的权力得到不断加强。党中央执行部创立了国会议员候选人公开招募制度,以培养党内人才和正式认可国会议员候选人。公开招募制度使党中央执行部掌握了重要人事决定权和国会议员候选人决定权,在一定程度上对国会议员形成了制约,加强了对国会的控制,使国会议员向党中央执行部靠拢。与此同时,都道府县支部联合会受国会议员个人后援会的影响也不断降低,党员也逐渐脱离了派阀的束缚,开始向党中央执行部靠拢。因此,自民党从“派阀—国会议员—国会议员个人后援会”的松散型议员政党模式转变为“党中央执行部—都道府县支部联合会—党员”的集权型组织政党模式,这有利于提高党中央执行部的权威,加强党中央的向心力与党内团结。

第二,党员和党友能够通过总裁选举限制总裁的权力,并对总裁进行政治监督。随着自民党总裁选举开放性发展,派阀势力的减弱和总裁权力的强化使自民党失去了限制总裁权力的有效机制,以至于安倍被曝出“森友学院丑闻”和“加计学院丑闻”后,仍然能够正常执政,并能够参加

① 中西孝介「自民が実名で初公表! 党员獲得ランキング“トップ 10 と ウースト 10”」, <https://www.fnn.jp/posts/00317770HDK> を参照。

② 中北浩爾『自民党—「一強」の実像』中央公論新社 2017 年第 232 頁。

③ 笹部真理子『「自民党型政治」の形成・確立・展開—分権的組織と県連の多様性—』木鐸社 2017 年第 45 頁。

④ 中北浩爾『自民党—「一強」の実像』中央公論新社 2017 年第 229—230 頁。

2018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并没有出现党内派阀领袖集体反攻的现象。但是,在2018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党员和党友对安倍表现出强烈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不少人将选票转投给安倍的竞争对手石破茂。总裁选举的开放性发展使党员和党友可以对总裁进行有效的政治监督,逐渐取代了派阀在党内的政治监督功能。如果总裁的施政方针符合党心,就会得到党内基层民意的支持,顺利实现连任;否则,纵然总裁得到大部分国会议员的支持,也会因党员和党友的反对而下台。因此,总裁候选人都开始重视通过网络媒体和地方演说的方式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安倍和石破都曾在各自竞选网站上发布相关的宣传视频,并访问日本各地,多次与党员和党友会面,以争取他们的支持。<sup>①</sup>因此,尽管总裁的权力在党内不断得到集中,但是由于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开放性发展,党员和党友逐渐成为自民党制定新政治游戏规则的重要参与力量,总裁不得不重视党员和党友的利益,并自觉接受他们的监督。

## (二) 对日本政党政治的影响

通过提高总裁选举开放性发展,自民党吸纳了大量的社会支持力量,对日本政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日本政党格局中,自民党“一强多弱”的政治地位得到维持。自民党自成立以来,仅在1993年和2009年有过两次下台经历,而且下台后都进行了党内改革,不断增加党员和党友在总裁选举中的选票,完善地方组织建设,这是自民党重新焕发活力并重返政治舞台中心地位的重要原因。反观获得大量国会议员支持的民主党,因缺乏党员和地方组织的支持,在其因政策失误下台后,国会议员纷纷退党,民主党也因此一蹶不振并最终解体。随着安倍的强势回归,自民党进一步重视发展党员和党友,加强地方组织建设,并持续推进总裁选举的开放性发展。总裁选举开放性发展使自民党更具包容性和竞争性,激发了党组织机体的活力,维持了自民党在国政选举和地方选举中的优势地位。而相比发展势头强劲的自民党,在野党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无法对自民党形成力量制衡。非共产党系在野党对日本共产党持有疑虑,与日本共产党存在隔阂,无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互信共赢关系。在小选区选举

中,在野党各自拥立候选人,导致左派选民的支持选票被分散而使自民党渔翁得利。<sup>②</sup>因此,只要自民党没有出现严重的政策性失误,在野党在短期内很难形成与自民党相制衡的力量,无法撼动自民党“一强多弱”的政治地位。

第二,日本政党政治总体呈现右倾化的趋势,在野党压力较大。冷战后,随着社会党的解体,日本民间右翼团体于1997年相继成立,如“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的青年议会”“日本会议”及其下属的国会组织“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等。<sup>③</sup>自民党总裁选举因此越来越容易被右翼团体所利用。右翼团体不仅影响着国会议员投票,也影响到了党员和党友地方投票。例如,“日本会议”倡导“重建美丽日本”的“复古主义”,积极开展修宪活动,是安倍内阁强大的支持力量,使日本政党政治呈现出急剧的右转发展态势。面对急剧右转的日本政党政治,在野党力量薄弱,难以应对自民党的扩张与压力。例如,日本共产党虽然有稳定的党员和地方组织,但是长期以来在党内政治生活上缺乏公开透明性,且其一些政策主张因过于理想化而脱离现实,经常受到自民党的抨击;而2017年成立的立宪民主党和2018年成立的日本国民民主党没有稳定的党员和地方组织,在激烈的政党竞争中不够稳定,它们将重蹈民主党解体的覆辙还是继续保持良好的势头仍值得关注。可见,日本民间右翼团体的崛起和政党政治的急剧右转给在野党带来了极大压力,如果它们想要继续生存、平衡日本政党政治,就不得不在加强组织建设、促进党内改革、强化党际合作、培养民间左翼团体等一系列措施上下功夫。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文慈]

① 徐万胜《论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及“后安倍时代”政局走向》,载于《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6期。

② 赵熠玮《从立宪民主党支持率看日本左派政党合作前景》,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5期。

③ 中野晃一《右傾化する日本政治》岩波書店2015年第107—108页。